运用新媒体拓宽社情民意联系渠道

□吕 品

新媒体的丰富多样化，为沟通社情民意提供了多种途径和手段，改善了政治参与的技术手段，提高了沟通效能，降低了执政成本，对于改善社情民意联系，密切党群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载体和中介就是社情民意联系渠道。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这种联系成为可能，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

新媒体的丰富多样化，为沟通社情民意提供了多种途径和手段，改善了政治参与的技术手段，提高了沟通效能，降低了执政成本，对于改善社情民意联系，密切党群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新媒体本身的“双刃剑”作用，加上使用者对新媒体的认识与使用不够科学、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和相关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使得用新媒体拓宽社情民意联系渠道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些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有待提高。媒介素养的培养与提升对领导干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部分领导干部不具有与新媒体相适应的意识和能力。表现为：在媒体意识上，部分领导与群众的期望有差距，对新媒体存在不同程度的畏惧、畏难或厌烦心理，或者要么把新媒体舆论视为洪水猛兽，想当然地进行堵、封、瞒、蒙，或者对新媒体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漠视网上民情而反应迟钝，丧失与群众进行沟通联系的机会。在能力上，有些领导干部仍侧重于新媒体的宣传、教育的功能，没有掌握新媒体沟通的规律和特点，不愿意潜心学习和研究沟通技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群众运用新媒体沟通的消极因素。新媒体使得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联系变得随意，群众倾向于使用这种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式来联系，导致部分群众新媒体参与的非理性化。这种随意性导致群众可能出现误报和虚报行为，此时新媒体所具有的动员、放大和催化作用易成为谣言的“助推器”和“放大器”，加上新媒体的匿名性带来的放纵心理，部分群众在政治沟通过程中冲动有余而理性不足。另外，不同群体在运用新媒体渠道方面存在数字鸿沟。目前我国城乡之间、不同省份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正在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据此不能简单判定数字鸿沟正在缩小。究其原因：一方面，2012年后，我国网民增速保持放缓的态势；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可能会因使用者能力和技能的差异而产生第二层次的数字鸿沟，而对于信息与知识的获取与利用的能力与意愿还会加深鸿沟的存在。

新媒体联系渠道自身产生的弊端。新媒体因其交互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虚拟性等特点，成为有效方便快捷传递信息的社情民意联系渠道之一。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新媒体渠道中的信息流也存在过量、无序和失真的问题。群众运用新媒体传递自己的利益诉求，大量信息的持续更新，出现信息过量和拥堵等现象，造成党和政府难以辨别人民群众真正的呼声和诉求。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零散地分布在各种新媒体上，缺乏现实目的性和方向性，很难引起相关党政部门的关注或介入。一部分群众利用新媒体的普及性和快捷性，倾向于采用越级沟通，其结果是越承担有处理具体事务任务的基层政府机构越得不到需要的信息，而越高级的宏观管理机构则越容易被群众选为沟通的对象。一部分群众利用网络匿名性，表达恣意，使网络上的情绪化认识、理性思考、思想认识偏差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交织在一起，增加了识别信息的难度，影响了民意表达的质量。另外，新媒体联系渠道抑制社会和情感内容的沟通。根据传播学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在面对面沟通中，各自会得到或“溢出”各式各样的提示信息，在通过电子或其他网上方式的沟通时，则不可能滤出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虽然新媒体传播渠道可以大大丰富知识和信息的沟通容量，但由于“溢出效应”的欠缺，反而导致人际间情感的隔阂和疏远，制约了沟通的内容和效果。

新媒体沟通欠缺规范性。我国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新媒体相关管理法规体制，尤其是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出台的司法解释打击谣言成效显著，但是仍然欠缺一部总体立法；而且立法往往是压力型和对策型立法，存在立法者的信息能力不足，缺乏充分的酝酿，导致立法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全面性有所不足，不能有效解决网络新发展带来的问题，实现对新媒体的科学规范。

与传统沟通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现在已经有了运用新媒体重塑传统社情民意联系渠道的趋势，但是还存在新媒体和原有的沟通渠道各自输入信息、缺乏有机的联系和协调的现象，这样不仅可能造成信息的重复输入，而且可能造成不利于多个沟通方式各自发挥优势，难以达到既定目的。

构建新媒体下良性互动的社情民意联系，我们要顺应潮流，调整思路，积极应对挑战，进一步推进新媒体下有序有效的社情民意联系，促进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

提高党政官员对新媒体沟通的认识和运用能力。领导干部应培养善待新媒体、善识新媒体、善用新媒体、善管新媒体全方位的媒介素养。善待新媒体的核心是领导干部要真正确立权力属于人民、执政为民的理念，尊重群众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在内的基本权利。领导要认识到信息垄断不可行性，摒弃宣传教育为本位的思想，注重与群众运用新媒体无障碍地双向沟通。树立了正确的理念，还需要提高运用新媒体沟通的能力。首先，要善于学习和运用最新技术成果，使社情民意联系在物质载体上保持与时俱进。其次，要了解新媒体沟通特点和规律，尤其是要与传统沟通渠道的沟通方式相区别，善于坦然面对包容不同意见。要注意沟通语言的转换，摒弃陈旧的话语体系。最后，要树立信息权威，及时利用官方权威的信息资源，及时、准确、权威地公布所掌握的信息，善于主动设置议题，及时灵活合理引导民意。

构建新媒体有序参与的保障机制。一是党和政府主动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大力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做到信息真实、充分、全面与及时发布。二是培育网络沟通文化，提升群众的媒体素养，提升人们在新媒体沟通中的道德文明水平、自律能力和沟通能力。三是完善新媒体沟通规则，建立定期沟通、及时反馈的制度，保证沟通的有效性，并对仅走形式而实质没有有效沟通的行为明确追究责任。四是遏制不良信息的传播，建立各类常态的舆情信息收集、预警、分析工作机制，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及时监管网络谣言传播渠道，确保新媒体的安全运行。五是改善信息占有和使用方面的不平等，填平信息鸿沟。既要对加强弱势人群信息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工具的拥有和使用技能，还要激发部分群众的主动运用新媒体进行政治沟通的意识和能力。

加强新媒体管理制度。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涌现，要加强新媒体规范管理制度，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织密新媒体的法律保护和监督之网。要将新媒体立法问题作整体规划、系统研究。对已经制定或正在起草的有关法律，应注意研究与增加涉及新媒体管理和信息安全的内容，注意法律之间彼此的衔接。

建设有机统一的沟通体系。从理论上来说，在执政党与民众沟通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沟通渠道以及需要多少条沟通渠道，是由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决定的。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执政党控制着主要的政治资源，占据主导性地位，所以它实际上决定着社会沟通渠道的设立和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一方面，通过新媒体和群众交流、征求民意，范围广、成本低而且真实，是有效的社情民意联系渠道和民主决策的机制之一。另一方面，要将新媒体社情民意联系与传统的社情民意联系方式有机结合，既发挥传统沟通方式的权威性强、约束力强，易于保密，可以保有感情内容沟通的特点，也注重发挥新媒体沟通方式即时性、便捷性、交互性、虚拟性的特点，组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形成多样化、多渠道的沟通方式，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

中央党校科研部、
报刊社
群众路线征文选登

◆新时期论坛

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社会共识

□杨 明

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央政治局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中办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与此相应，近年来社会各界也高度关注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的建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全党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我认为，从我国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用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引领”和“凝聚”的迫切需要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精神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重大任务，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文化精神建设，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当前我国的文化精神领域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集中表现为用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

艰巨复杂是由国内国际发展大局的深刻变化所决定的。从国内来看，我们正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打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从国际来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变为文化软实力、外交巧实力的竞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背后是各种价值观的激烈较量。如何在国内国际各种思潮的激荡中确立主流主导？如何在“众声喧哗”的国际舞台上取得中国应有的话语权？如何凝聚起全国人民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力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问题，给“引领”和“凝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艰巨复杂是由当代文化精神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所决定的。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化精神的生产是少部分人的专利，文化精神的传播主要依靠专门的组织进行长期的单向度的教育灌输。然而，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形成了巨大挑战。伴随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应用，各种文化精神的生产和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支撑，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和建构方式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直接感知与建构转化为通过“虚拟社会”间接感知与建构。人们在客观社会环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受到网络文化越来越大的影响。加之网络传播的全球化、即时性，国际范围的价值观较量在网络这个平台上“短兵相接”。面对这样的态势，“引领”和“凝聚”越来越艰巨复杂。

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同心同德而不是离心离德，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是客观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顺应了这样一种客观情势。

“引领”和“凝聚”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引领”和“凝聚”的基础，之所以能成为“基础”，我认为这是由24个字概括的科学性、稳定性所决定的。

首先是科学性。价值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联系的，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价值观的主体既可以是单个的个体，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民族、社会、国家等。现在24个字的概括，既体现国家的价值追求，体现社会的价值追求，也体现了公民的价值追求。这是一种科学的选择，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构建了基本框架。

其次是稳定性。核心价值观，应该从党和国家长期坚持、广泛宣传、已经深入人心、群众耳熟能详的思想理念及提法中提炼，而不是去重新编创一套全新的表述语。24个字的概括就体现了这样的坚持稳定性的精神。“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们党30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定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奉行的核心价值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2001年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提出的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中所选取的。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精神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价值遵循，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主动积极发声干预，充分运用好各类技术手段，做到全媒体、全覆盖，推动宣传思想工作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要发挥好基础的作用，还要“跳出文化做文化”，充分展示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使之融入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公民个人生活的各领域全过程。做好“融入”这篇大文章要着眼于以下几个重点。

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今天是我们民族应该反思自身文化精神命脉的时候了！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要与各类政策法律体系相协调。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创造条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要与公民基本价值诉求相适应。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基本价值诉求，只有与其相适应，这种核心价值观才能入耳入脑入心。因此，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好表率作用。党校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我们一定要加强教学研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融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全过程各环节。

◆专家视点

准确地推进改革 考验治理能力

准确推进改革，在程度、方向、速度上都有精细的要求。改革如同在未知的道路上驾车，既要把握好方向盘，又要操控好油门和刹车，并且使三者有机联动。

□陶文昭

分部署，九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改革不行，改革力度小了也不行；改错了方向不行，没弄清楚就改也不行；改革拖宕不行，改革抢跑也不行。这一系列的“不”，构成相互关联的底线、边线和红线，为准确地推进改革确立了边界。在改革进行了30多年之后，我们的经验更多了，我们的认识更深刻了，我们对改革的规律把握更透了，我们调控改革的力量更强了。从某种意义上，改革逐渐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准确推进改革，涉及把握“度”的精细问题，既要技术、还要艺术，属于高难度的动作，考验我们的治理能力。

改革的程度线：不改革不行，力度小了也不行

不改革不行，因为改革是旗帜。是否改革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0多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郑重嘱托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个话极其深刻。今天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

不改革不行，因为改革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回顾过去，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面对未来，我们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因此，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出现什么干扰，都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改革的前置词是“全面”和“深化”。不折不扣地贯彻这个决定，不仅要看是否改革，而且要看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是否达到要求，也就是说改革要有力度。

改革必须全面。这次改革决定包括3个板块、16个部分、60条、300余项改革举措，是一个非常全面而具体的改革纲领。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而是整体的全局的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各地方、各部门和各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以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来要求、来工作，完完整整地落实改革的各项举措。各地方、各部门和各单位不能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搞选择性的改革，有利于自己的就改，不利于自己的就不改。

改革必须深化。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深化的改革，就是要触及利益和体制。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要一鼓作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如果这个时候瞻前顾后、畏葸不前，绕着困难走，雨过地皮湿，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改革的方向线：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不能盲目推进

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国际国内都有过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不起折腾。因此在改革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确保改革大环境的安定和大方向的正确。

除了方向和大局不能犯错误，还要注意避免具体改革的失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是一个科学的改革纲领，是推进具体改革的指南。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各项改革举措，不要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不要不明就里、大而化之。要研究思考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要认真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要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有风险，在未知领域进行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准确理解、大胆探索和避免失误要统筹考虑。

改革的速度线：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

改革太快不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稳中求进是工作的总基调。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要避免急躁。一是起步时不要抢跑，听从中央的统一号令。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就极富有系统性。中央还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改革中还要注意，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中国是个情况非常复杂的大国，先试点再推开是有效的工作方法。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要将改革与制度化、法律化有效结合起来，使得改革更富有正当性。二是速度上不要过急，把握好“逐步”的要求。这次决定中重要改革用了很多“逐步”二字，诸如财税体制改革要“逐步”到位，部分社会保障、中央和地方“逐步”理顺事权关系，“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教育上“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等等。改革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积跬步致千里。

改革太慢不行。改革要积极稳妥，这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只讲稳妥不讲积极不行。不能一讲逐步，就无限期拖延；一讲稳妥，就停滞不动。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得抓住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前就是要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改革要有时间表，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设计到2020年，要求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改革的任务极其繁重，而剩下的只有七八年时间，不能不说是时间紧、任务重。要完成改革的军令状，等不起，拖不起。改革要慎重，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而是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